

从编辑到出版思想家

——评李昕先生著《一生一事——做书的日子》

王超逸

《一生一事——做书的日子》是李昕先生的长篇文学自传(以下简称“自传”)。全书30多万字,今年上半年,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。近日,我通读了他的这部自传,得知了更多名著背后的故事,了解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出版思想史,也试图把握传主的心路历程和思想体系。

作者是在人生30岁而进入社会、步入仕途的。他的家学、师承自不必说,仅是时代之助,就似乎为他的事功铺设好了未来人生的路向。从人民文学出版社、香港三联书店、北京三联书店,然后商务印书馆,横跨了四大名“殿”,这在当代学人中几乎是唯一。

他的人生起点是1982年。这一年,李昕犹如一只黄嘴春燕,欣欣然投入了春的怀抱。

——这是属于他的时代。

本文结合他的自传,从以下6个维度,试析作为出版思想家的李昕学案,以探究自传背后的学理。

一、素淡而醇厚。他是位素淡而醇厚的人。自传的文风,作者娓娓道来,如数家珍,波澜不惊;如话桑麻,围炉夜话。虽是往事,又如在眼前,或如未曾逝去的昨日的孤帆。这是位年过七十岁的老者在向后人倾诉,向历史倾诉。其实,在他的白描手法平素淡雅话语的背后,不难感触到他的一颗爱故园、爱生活、爱生命的灼热的心。他的舒缓节奏背后是汹涌的波涛。他爱着他的编辑岗位,爱着他的故园汉字,爱着在汉字土地上辛勤耕耘着的耕夫们。他也是这块故园耕耘伙计中的一员。读者从他清静素淡的文风中,观赏到了他心境星空中倒映着的心房叠影的多姿、妩媚和深邃,品咂出了主人心境的凛冽和醇厚。甘也甘,苦也甘,总之是有色彩、有响动、有滋味的。

二、宁静而致远。他是位宁静而致远的人。当下社会,多少聪明人迷失了自我,守住一份心境,并绝名利权力,方是真名士、真风流。

淡泊、宁静是原点,是心力,是定力,是执一。明志、致远是抒志、事功,建功立业,一发天纵之志,是归宿。执一不失,方君万物。

在自传中,李昕讲了到港后的两个故事。一是初到香港倍思亲。为了通信节省几个铜板,每个周末总要跨界从香港到深圳的邮局,通过内地电话与妻儿、家人联通。一是李昕从北京出差回港,把一沓出租车票交给他的“小秘书”,小秘书过一会儿找上来跟他说:“李先生,你这张票不对。”他一看,那张出租车票上面写的日期与他回内地出差的日期不契,小秘书给他挑出来了。原来是他乘坐出租车时,司机告诉他车上打印机的功能坏了,出不了车票,司机只能找一张旧票给他。

像跨界通话、报销出租车票的故事都是小事,但是,个人修养的养成都是在日常伦常之中,这正是李昕素淡、宁静的品操,这与他在处大事时的决断力、果敢、豪气不仅不矛盾,更是统一的。

设若李昕没有择路远行的基点,断然不会有他而后的博通万物、高趣自得、大笔写意、蔚为大观。

三、平实而高明。他是位平实而高明的人。他的生活平实,工作平实,话语平实,思想平实。每当他完成一件特设的阶段性出版工程,总是用平实的心态作出务实中肯的总结,既是对自己足迹的回顾、自我的肯定,又留给同事同行和历史,存入出版史的档案,以启来者。但是,他的平实不是平凡,平实中蕴含着高明,是对生命哲学的醒悟觉解。

履新香港三联,是对他的一次大考。国际化要求首先是对国际化差距的自觉认知,其次是主动融入国际化,再次是引领国际化,开出中国式国际化,立体还原为现代化人的本质。李昕入行香港的“杀威棒”,是满满的干货,果敢、质量、效率、效益——这

就是香港定律,这就是香港三联作风。香港8年,他实现了人生的沉潜和超越。从编辑加工、书稿审读、选题策划、经营赢利,到拍板决策,他实现了从“专家”到“出版思想家”的脱胎换骨和思想升华。其间,虽然如他说,新的环境、形势、任务,要求他必须成为“杂家”,他不得不暂时告别“当一个文学评论家”的追求。实际上,他的“文学评论家”的质地、禀赋在沉潜,在酝酿,有朝一日会开坛,会爆发。

笔者理解,现在的“杂家”之说,是指学术思想的熔铸古今、会通中西,是集大成者。笔者界定李昕是当代出版思想家。那么,李昕在入仕的第一步,就立志以编辑为职业,以兼及“文学评论家”为人生。为了将人生与职业统一,在浅层里,他拓展了编辑职业,而在深层里,他提纯了(或者说隐忍了)“文学评论家”的人生愿景,在更幽深的心智瀚海里,他执着地以人生(以“文学评论家”自许)为体,以职业(编辑)为用。随着阅历的积累,他将编辑职业拓展为“编辑出版”“出版思想家”的目标。作为杂家,他的学术视野,从学术范围看,包括了人文学科、社会科学,甚至包括了自然科学、生命科学。我静心通读了他的这部自传,我的体认是贯综、通透、会通。内里闪闪跳跃着的是艺术哲学上的独立断识、真知灼见,不啻是一部当代百科全书、当代学术史、当代思想史(或者狭义的定位是一部当代出版思想史)。作为思想家所规定的学术范畴和架构都已蕴含其中,从出版宗旨、使命、愿景、目标、出版哲学、核心价值观、精神、作风、经营理念、管理理念、创新理念、服务理念、社会责任、审美理念,甚至新质文化力——星罗棋布,可以说胸中有全局,目光贯始终,伏线埋千里,具有鲜明的学术性、计划性、指导性。

四、简易而精深。他是位简易而精深的人。首先,他是简易之人,谋定而后动,果敢,自信,雷厉风行,懂经营,有魄力,干实事。无论是切换赛道,还是面对歧路诱惑,都明理取舍。但是,他的简易,不是未知彼此,未明就里,不是莽冲,而是知己知彼,守机待时,行所当行,止所当止。他的简易中蕴含着把握“时”与“机”的精深奥理。李昕的选择始终有主旨、主线、底线,都是胜算,是向着宽度、高度、深度、精度在延伸,在拓展。始终有新能量、新激情。既有赤诚的眷恋,更有挥手的决绝。

这是内在的禀赋、时代责任感、历史使命感,激起的主体性所生发的天然的内生的自由自得的精神境界。

五、遗憾而完美。他是位遗憾与完美交织于一体的人。自传中有多处直抒胸臆,写到了作者的遗憾。

作为出版家的他看中的文稿和作者,一叹梦寐以求而不得,二叹得而复失,三叹错失良机,四叹财力不足,五叹送审未过,六叹分拆星散,七叹人品与书品名实不符,八叹作者的“达”与“作达”。大千世界,社会中现代病、后现代病在出版的窗口瞭望得更清晰分明。读者也随李昕的一波三折而起起伏伏,随李昕的扼腕叹息而暗自神伤。通过李昕孤灯默语、衣带渐宽的精神,读者深切感受到了李昕内生的特殊的历史使命感。出版是不闻戍楼刁斗的沙场,李昕和他的团队攻城拔寨,完成了上级组织交给他的战略性任务,更践履了守土尽责的道德自律。

其实,遗憾就是完美,完美也是遗憾。李昕先后履新的四大“殿”,都是历史悠久的大殿名殿。以人民文学出版社、商务印书馆、生活书店为例,“人文社”的创始人冯雪峰留下了人生的大遗憾。许觉民曾专门写了《雪峰的遗憾》一文,其实,该文只是说到了雪峰遗憾的不足十分之一。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张元济先生以下和献壁般守卫文化的至诚,搜求刊布天下文献孤本。当年,日寇的上海炮火专为了断“商

务”珍藏的孤本秘籍,断我族的文化根脉。难以想象,张氏情何以堪?“生活书店”的奠基人邹韬奋先生于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逝世,享年仅50岁,离开了他心爱的新闻出版工作,离开了他毕生致力从事的伟大的爱国民主事业。《庄子·天下》说:“一尺之捶,日取其半,万世不竭。”古代贤者早就悟得了“理在事先”的哲理意趣。从时间与事业依存关系的角度说,其实一生只能做成半件事,“一生一事”只是标举矢志于一个岗位(职业)、一个行业、一份事业,与一个时代的社会制度设计的长长的大的事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

六、至诚而豪情。他是位至诚而豪情的人。自传选择了数十幅作者的工作照,读者可以看到,李昕的肖像总是严谨、内敛、蕴藉、清澈的,他的严谨清澈中是他的至诚,他的豪情蕴含在他的至诚中。他落笔为文,作为一位清醒的出版家,他知道文字寿于金石,他的眼光不仅掌握着尺度,更掌握着尺度的尺度。自古编辑、出版、图书管理也是一门学问,是大学问,是古老又年轻的典型的综合学科,涉及学科、产业、行业、科际整合、战略规划、经营、管理、创新、中西文化比较、国际化视野等大科学、大艺术、大经济学、管理学,它需要史家的断识、理性和冷静,也需要诗人的天赋、哲人的睿智、管理学家的眼光、企业家的迅猛。

纵览李昕的职业历程,从事功方面说,他回首往事,他的得意之处有二,一是终于推出了傅高义先生著《邓小平时代》一书,一是终于推出了王鼎钧先生系列丛书。用军事术语来说,这是两场硬仗。玩味他以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名义致王鼎钧先生的《函》,他将做人的笃诚与做文的汪洋恣肆熔于一炉。他平生的情操、境界、豪情,皆纳于一袖风云。本是一恒常的商业信函,他将其工具性的实用文写成了文学性的书信体散文,外行人只看其皮相,内行人通过书信结撰的纵横捭阖、起承转合,看到了字外字,听到了弦外音。它的遣词明丽,文采丰腴,情感沛然,命意切切。他的仁道、悲悯情怀都蕴含在他的至诚与豪情中。窃以为此文是完全可以上中学语文教科书的。

香港工作的多年历练,他融入了香港的思维节奏,完善了会通的视野,涵养成了一种大而广的气象,由此气象内化成了个人的心性习性。执掌北京三联书店的擘画,使他的智慧才能得到尽情抒发。李昕大半生只做了出版一项事业,从国内到涉外,横跨四大名“殿”,始终以“古今中外,提高为主,集纳经典,传播文明,启蒙、现代化”为旨归,他的成功之道,缘于“认真地、严肃地、献身地”躬身入局的不息至诚,去从事他所乐之的事业。他从青少年时枕边抱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始,以信守“人生不该虚度”名训自励。在自传的“后记”中,李昕坦然自评:“这辈子过得值”“我无疑是一个幸福的人”。

世间一些有大成就的学人,其思想的成熟圆融是在晚年,甚至是暮年。李昕正当盛年,他还在思考的路上。士林对他的悬设期许是当代思想的又一高峰——“当代出版思想家”,他尚欠他的故园故国三大笔债——“当代出版思想史”“出版经济学原理”“比较出版文化学”。这一鹤的,一个世纪以来,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,从张元济、王云五、邹韬奋、冯雪峰、赵家璧、胡愈之、郑振铎、范用、傅璇琮、陈早春诸前辈,建立故国的“出版经济学”,推出故国的“出版思想家”,都是他们的百年伤痛,世纪大梦。

这份承天命的大任,就自然地托命在了李昕肩上,这是历史的选择,也是别无选择。

士当弘毅,任重道远。③5

(作者系北京大学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)